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1.01.011

# 公共产品视角的语言供给经济学分析<sup>\*</sup>

——以教育部调整汉字写法为例

祁 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 武汉 430073)

**摘要:**网络效应、语言的政策性和语言滥用的市场失灵使语言的公共产品属性进一步强化。语言是公共产品但不是纯公共产品,宜采用以政府供给为主、其他主体供给为辅的混合供给方式;语言的使用主体具有层次分明的特点,因而语言的供给要采用分类供给形式;作为公共产品的语言,其供给过程要充分考虑使用主体的偏好和意愿;语言的调整是制度变迁的一种体现,要充分考虑到语言调整的路径依赖性,并将其纳入到制度变迁的成本中予以考虑。政府作为掌控资源的语言规划的决策者,在语言调整的博弈过程中,要做到中立,最大限度地反映主流文化和主流使用主体的意愿。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公共产品供给方式;需求主体偏好;语言规划;语言调整;路径依赖;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1-0058-08

##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Supp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Goods

—Tak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s Regulating Chinese Writing as an Example

QI Yu

(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Network effect, the policy on language and the market disorder of language abuse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attribution of public goods of language. Language is public goods but language is not pure public goods and should be mainly supplied by government and by other secondary supply methods. The use of the languag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bvious hierarchy, so the supply of the language should use classified supply methods. The language, as public goods, should sufficiently consider the preference and willing of using subjects in the process of supply. The adjustment of the language is a kind of embodiment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should sufficiently consider its path dependence and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cost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for the considering. The government, as a decision-maker of language plan in mastered resources, should be neutral and reflect the willing of mainstream culture and mainstream users to maximum exte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game of language adjustment.

**Key words:** economics of language; public product supply method; demand subject preference; language plan; language adjustment; path dependenc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 收稿日期:2010-11-12;修回日期:2010-12-03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课题(2010S0601)“英语语言国际推广对孔子学院办学的启示:语言学和经济学研究的视角”

本文为“首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会议论文,感谢与会黄少安教授、宁继鸣教授、张卫国博士、黄凯南博士的建议,尤其要感谢田丹、陈婉在讨论中提出的极具价值的意见。

作者简介:祁毓(1987—),男,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学习,主要从事财税基础理论研究。

## 一、引言

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根据学术界反复讨论的结果,决定汉字原则上不恢复繁体,这一表态终结了一段时间以来汉字简繁之争。在同日,教育部还发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中不仅恢复了51个异体字,还拟对44个汉字“动刀整形”,调整写法。一时间,官员、学者、普通居民以及各大网站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两方面:一是“整形”的44个汉字绝大部分具有通行度高、易于识别的特点,一些字在“整形”后反而不规律、不统一,给运用徒添麻烦,有违推行新汉字表方便信息储存和管理的初衷;二是新编制的《通用规范汉字表》虽然经专家8年全盘考虑、反复研究才得以出台,但仅仅考虑专家们所说的汉字“字理”问题,而忽视普通使用者应用是否方便。当然,教育部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对外发布这条信息,并将相关意见上报国务院,从这一点上看是对公众语言需求偏好和意愿的重视。

其实,细细思考不难发现,其中折射出语言的诸多经济属性。首先,语言及其调整是一个公众话题,涉及千家万户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其次,语言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其调整确实影响着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同时对就业和劳动收入产生一定影响,会打破原有均衡状态。一个社会中的语言现状及特征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偏好和选择,进而会影响到人们的社会活动和交往及其结果,从而影响秩序的形成,并导致了不同的规则及其多样性。再次,语言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社会制度(Searle,2005),其供给是否有效,关键在于这种语言制度是否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同时,语言的调整也是一个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可能是由于社会与经济行为、组织与变迁的供给进步的结果,还可能由对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致,那么语言的调整的关键在于调整后的语言所产生的经济绩效是否大于调整前的经济绩效。最后,无论是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还是制度属性,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语言的公共产品属性的认识,作为公共产品的语言在供给的调整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语言需求方的偏好及意愿,以此形成语言公共品供求的动态均衡。

## 二、文献述评

一个社会中语言现状及其特征会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偏好和选择,进而会影响到人们的社会活动和交往(或社会博弈)及其结果,从而影响秩序的形成、形态,并导致了不同的规则及其多样性,即非正式的约束规范,最终通过法律制定和普通法的前例而变为制度,即社会或群体内部的正式规则中的秩序及其所显现出来的规则……语言标识了使人成为人的存在和能力的独特的约定俗成的秩序,即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语言与思维是紧密相连的,而人的经济活动离不开思维活动。所以,人的交易、交换等与人的语言是密切相关的(朱成全,2004)。至今为止,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少得可怜,以至于在文献综述几乎可以按照作者姓名介绍研究成果 Grin(1996,2000)。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和运用。

最早对语言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当属亚当·斯密和弗里德曼。亚当·斯密认为语言的成长符合“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弗里德曼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语言与市场的自发成长过程是相似的,语言是一个能够逐渐演化的复杂的而又相互关联的结果,不需要任何人按照任何规则设计它,它是随着千百万人的语言交流自愿合作建立起来的。但这只是早期比较零散的观点。真正开始研究语言经济学的当属 Jacob Marschak,他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也具有价值(value)、效用(utility)、成本(cost)和收益(benefit)等经济特征,并认为这是影响语言和经济两种活动的内在机制。这是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的关于语言的经济学观点,虽未引起重视但为此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对 Marschak 的观点提供了更多的支持。1970年至1980年人类开始关注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认为主动获得语言能够在经济竞争中获得优势,从此双语对收入的影响及语言和经济的关系成为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力资本(Breton,1998),因为语言知识基本上是知识资本的积累(Grenier和Vaillancourt,1983),学习一种或多种语言所花费的费用以及时间是对人力资本特殊形式的投资。语言需要投资,需要花费成本来获得,同时语言具有生产和消费性,人们可以对语言进行投资以获得长期利益或者短期利益,也可以对语言进行生

产和消费。在实践中表现为双语具有很强的优势作用和竞争力,并对收入产生重要的影响。Silten 和 Pool(1991)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的文献进一步为语言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Holden(1987)研究了跨国公司在劳动力属地的语言政策,Colomer(1991,1996)对发展中国家外文翻译工作的比较经济效益进行了研究。总之,国外有关语言经济学的探讨已粗具规模,语言经济学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国内有关语言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基本上属于对国外研究的引入、介绍和述评,其中对语言经济学进行深度研究的当属汪丁丁(2001)和张卫国(2007,2008)等。汪丁丁(2001)的《语言的经济分析》一文初步建立起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张卫国(2008)从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三个角度对语言经济学框架进行了拓展,特别是有关语言的公共产品和制度属性是对该理论的深化。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为提高福利的系统、理性,以理论为基础的解决语言问题的工作是典型的由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推行的,对象是其通知之下的部分或所有人,语言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社会福利(Grin,1994),因而,语言规划显得尤为重要。薄守生(2008)探讨了语言规划的成本收益、语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以及语言、语言资源与语言环境等方面的内容。以往的研究把语言资源、语言环境孤立于语言经济、语言人口之外,导致研究定位不准,而实际上人口迁移对语言变异有一定的影响,语言的统一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语言“大同小异”的发展趋势可以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宏观结论。语言规划的重要性使得政府在语言政策的实际制定上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要求,统筹兼顾。李增刚(2009)就认为,语言文字除了表达相应的信息之外,还要具有美感,能够准确表达文字的含义;但作为交流工具,语言文字不再承担相应的功能,其目的就是让更多人能够采用这种文字相互理解对方的意思。也就是说,经济学所强调的效率、节约,强调的在既定成本下的产出最大化或产出既定下的投入最小化原理则同样适用于语言文字。对此,张卫国和刘国辉(2009)认为,语言文字由繁琐至简约是语言变迁的一条经济规律,目的在于降低交易成本;而保持文化遗产的需要却又使语言文字停留在持续多样化上,从而体现了语言文

字变迁经济规律与现代人文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需要间的矛盾。

综上所述,目前对语言规划的经济学研究只是停留在认知层次和理论层面,还未深入探讨其有效提供、合理安排的有效措施及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实适用性。本文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网络效应、政策性和市场失灵四个方面解释语言的公共产品属性,并以近期教育部调整部分汉字写法这一事件为例,运用语言的公共产品属性理论探讨语言在供给调整过程中(又可称为“语言规划”)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当然本文更多的是从语言经济学理论应用性的角度进行分析。

### 三、语言的公共产品属性分析

一般说来,私人物品具有消费上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是指某一消费者对某种物品的消费不会降低其他消费者对该物品消费水平(Samuelson,1954),而非排他性是指消费者对某种消费品的消费无法排斥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或者排斥他人消费的成本太高。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显然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在一个语言群体里,特别是一个语言异质性的国家或地区,语言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传播来完成的)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张卫国,2008),Dalmazzone(2000)就指出语言传播而产生的收益主要来源之一是语言群体边界的溢出效应。也就是说通过语言的广泛传播,一方面可以降低不同语言群体间的交易成本,如为促进贸易往来、相互合作学习以及相互间的协作及管理提供便捷,减少相互间交往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张卫国(2008)认为还能够降低不同语言群体相邻或交界地区的信息处理与交流、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以及不同语言人群中共享的服务成本。从最初公共产品属性的起点来看,一个居民对语言的消费或者使用不会影响到其他消费者对该种语言消费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很难排斥其他人对该种语言的使用。2009年8月,教育部调整若干汉字写法的征求意见稿,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语言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作为公众日常交易活动的基本工具,人人都使用它,人人都有对它的调整发表意见和看法的权利,公众既是语言的使用者,又是语言能否得以应用的最终决定者。

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主要是基于语言具有非排

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属性,同时还有其他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即网络效应、语言的政策性和语言滥用的市场失灵。

网络效应又被称为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是信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某种信息产品对一名用户的价值取决于使用该产品的其他用户的数量,也就是说,信息产品存在着互联的内在需要,这种产品的需求的满足程度与使用该种产品的网络规模密切相关,只有一个使用者的信息产品是毫无价值的。这主要是因为网络中的少数使用者,不仅要承担高昂的运营成本,而且只能与数量有限的人交流信息和使用经验;但是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将使不利于规模经济的情况不断得到改善,每名用户承担的成本将持续下降,同时信息和经验的交流范围得到扩大,每名用户都能从网络规模中获得更大的价值。语言作为一种典型的信息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语言的公共产品特性与其网络外部性相互强化(张卫国,2008)。

语言的政策性体现在与语言有关的各项政策的制定上。语言经济学最早是用来指导国家宏观语言政策的制定,它通过全面测度语言政策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以及预期的社会效益、个人效益和文化效益,从不同语言的总成本和总收益比较来指导国家语言政策。语言政策性的作用体现在通过一定的语言政策安排来减少各群体间的摩擦、促进相互间的融合上。北美各国每年都会出现大量的移民,为稳定社会,让移民尽快融入社会并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各国制订了相应的语言政策来加快移民及其后代融入社会的进程。F. Grin(2003)就指出,语言政策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的,为了提高福利的系统、理性,以理论为基础的解决语言问题的工作,是典型的由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来推行的。

网络效应和政策性使语言的公共产品属性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但真正使政府参与到语言的供给过程中,还在于语言领域的市场失灵以及由此产生的机会主义和逆向选择。一方面,在有关语言推广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语言推广是一种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在语言推广领域出现私立语言学校和公立学校并驾齐驱的态势是符合经济学的原则,但是由于语言推广具有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和政治扶持的特点,如果政府不起主导作用,私人组织是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F. Grin等(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语言

与收入之间有着显著的关系,语言的掌握程度和丰富与否都极大地影响着居民收入,而如果一旦在语言推广市场中出现政府缺失,会进一步加剧市场失灵。另一方面,语言必须是一项事前确定和安排好的制度,否则会出现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倾向。虽然亚当·斯密和弗里德曼指出语言是一个能够逐步演化的复杂的而又相互关联的结果,不需要任何人按照任何规则设计它,是随着千百万人的语言交流自愿合作建立起来的。但这种由人们通过口头或其他非正式形式达成的非正式契约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单纯地依靠自我实施难以实现,往往需要权威者的强制实施,也就是政府事前对语言这一信息产品的各类属性、使用方式等进行规制,以减少使用语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否则就会出现以语言为工具和手段的各类欺诈活动。

#### 四、作为公共产品的语言供给的若干原则

语言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网络效应、政策性等使其公共产品的属性逐步增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语言具备公共产品属性的必要条件,网络效应作为语言这一信息产品所特有的属性进一步深化了其公共产品的属性,语言的政策性和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市场失灵使政府成为语言产品供给的主体。教育部调整44个汉字写法是政府调整语言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表现形式,整个语言调整过程体涉及语言作为公共产品的方方面面,包括供给主体、供给形式、需求偏好反映等,其中还折射出语言作为一种制度在调整(可以看作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过程中应该注意的种种问题。

1. 语言是公共产品但不是纯公共产品,采用以政府供给为主、其他主体供给为辅的混合供给方式符合经济学的原则

纯公共产品是指多为一个人提供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严格为零,且不可能不让人们享受该物品的公共物品。一般而言,纯公共产品比较少,斯蒂格利茨(1999)就认为,使用的边际成本和排他容易程度是判断一个公共产品类型的最主要指标。以此来判断,语言供给的边际成本应该较低且几乎为零,但是语言依旧为准公共产品。这主要是因为像语言教育、语言国际推广等方面的供给具有消费的局部排他性,同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张卫国,2008)。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讲,主要源于语言作为公共产品

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官方语言、语言角度、语言推广、语言调整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决定了语言的公共产品的“纯度”是不一样的。

语言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并不妨碍政府成为供给的主体,这也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生活中类似官方语言的确定、语言调整、语言的教育等供给均是由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对于一些准公共产品而言,如果由政府以唯一供给主体的形式出现,往往会由于组织个人差异、官僚政治程序与风险厌恶等造成的效率低下问题,解决此类的问题的办法在于引入市场机制,即其他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到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中,这种混合供给的方式符合一般经济学的原则。当然,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产品供给还有其他方式,如以生产者或提供者(安排者)的方式出现(贾康和孙洁,2006)。某种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政府提供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完全依靠政府雇员和设施来生产这种产品和服务。只要提供者和生产者合一时的总成本大于将提供者与生产者分离时的总成本(含外部交易成本),则把提供者和生产者功能分开是值得的(Williamson,1979)。市场经济环境下,对提供者和生产者是合一还是分离作出合理选择,其意义是十分明显和十分重要的(Ostrom、Tibout 和 Warren,1961)。对于语言这一准公共产品而言,其生产和提供也可以而且实际上亦是如此。

教育部调整汉字的行为可以看作是由政府主导供给准公共产品的过程。在供给的过程中,最先由相关专家进行长达8年论证,并向教育部提供调整方案,最终由教育部向公众发布征求意见稿。这个过程可以认为是准公共产品生产和提供分离的过程。专家组是由政府付费雇佣的语言这一准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在生产的过程中,专家组充分发挥各自在生产中的优势,进行论证、讨论、反复修改和达成一致,并将最终产品以研究结论的形式上报教育部;教育部作为语言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最终产品提供给语言的消费者。这是一个有效率的过程,生产语言这一准公共产品,专家组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专业优势;而教育部作为语言准公共产品的提供

者(安排者)具有优势,也就是具有语言实施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单纯地从公共产品生产者和提供者分离的角度看,这的确是有效率的,一方面,语言文字的调整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信息收集、组织论证、调查取证、专家修改、征求民众意见等多个环节均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并且从语言的推广来看,与货币类似,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强制性的推行,也就是说语言规划离不开国家主体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语言文字调整遵循了经济学的斯密定律,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合理的分工能够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率。但是,有效率并不一定能产生好的实际效果,从教育部调整发布《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以来所引发的争论来看<sup>①</sup>,这一轮汉字调整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在生产环节出现了一定的纰漏。生产的过程中没有协调好供与需的关系,而通过事后弥补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将会面临着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 2. 语言的使用主体具有层次分明的特点,决定了语言的供给要采用分类供给形式

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其使用主体具有鲜明的层次性。文字是语言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一种有效载体,不同的语言文字,其使用群体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比如在一般情况下一些专业性的语言文字有其固定的使用对象,而日常用语是供大众使用<sup>②</sup>。这就决定了语言文字的供给要采用分类供给的形式,至少在提供具有各自不同使用群体的各类语言文字时,要充分考虑各自不同需求群体的习惯、偏好以及环境的适应性,以使语言文字更充分地满足不同需求群体的使用需要。

《规范汉字表》分为三级:一级字表收常用字3500字;二级字表收通用字里的非常用字3000字,它与一级字表里的3500字合起来叫通用字;三级字表收专用字4840字。三级字表定义为专用字表,是在人名用字、地名用字、古籍印刷常用字、科技普及用字四个方面对通用字所作的补充。《规范汉字表》的分级正是基于满足不同需求主体的多样化需

① 某网站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对“你认为调整这44个汉字是瞎折腾吗?”这一项,90.15%的网友选择“是”,5.66%的网友选择“不是”,另有4.19%的网友认为“无所谓”。大部分持反对意见的网友则认为,汉字是一种负载信息的书面符号,只要人们普遍愿意使用并能明白地表达其意思,这样的汉字就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使命,无需修改;反之,那些容易让人产生歧义,或者书写不方便的汉字才需要修改。

② 普通公众不是不能使用专业性语言,而只是说由于其工作环境使其很难运用到这些专业语言文字。

要的现实而进行的,符合语言供给要采用分类提供的原则。

教育部及专家组对部分语言汉字进行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满足不同汉字使用群体的需要。正如《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宁教授指出的,现在恢复的繁体字都是必须恢复的,比如硃砂的“硃”,这是一个科技用字,但它恰恰是一个繁体字,所以这个字不能不恢复。本次汉字调整的原则是根据中国传统书法的习惯,例如,字在左边的偏旁如果最后一笔是“横”的,我们一般变“提”,因为变了提以后便于更连续地书写右边偏旁的上边,这是我们任何写书法的人都要这么写的,这么写是我们的一种传统习惯。在具体分析此次教育部调整的44个汉字时发现,有相当部分修改的汉字具有通行度高、易于识别的特点。“通用字”有两个含义,从使用度出发分出来的通用字,与罕用字相对;从字义所属的类别出发分出来的通用字,与专用字相对。也就是说公众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已经习惯了这些文字的写法,如果进行调整会导致事与愿违的情况出现,使社会调整原有的习惯成本无形中提高,而修改后的大多数汉字能否给社会带来额外的收益还无法断定。如:“琴”字左上角“王”字最后一笔由“横”变为了“提”;“唇”字的厂字头由半包围结构调整成了上下结构,“亲”“杂”“杀”等字底下的“竖钩”改为“竖”,最后一笔由“点”改成“捺”等。虽然,调整只是供阅读或者供机器、电脑来用的字形,但是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仅仅基于机器语言的适用性而进行调整似乎显得矫枉过正了。

### 3. 作为公共产品的语言,其供给过程要充分考虑到需求——使用主体的偏好和意愿

一个合理的公共产品供求均衡状态要充分考虑到供给方的供给能力和需求方的需求偏好。有关供给能力方面的考虑在前两部分进行了分析,而需求方也就是需求主体的偏好和意愿往往成为决定公共产品供求均衡的关键。考虑需求方的意愿和偏好主要是指在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和供给总量时,要将供给能力和需求主体的偏好和意愿有机地结合,要将需求主体的偏好和意愿以自变量的形式纳入到供给决策函数中予以考虑,只有这样,一个有效率的公共产品供给才会出现。需求主体的偏好和意愿包含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需求方有显示自己偏好的机制和意愿;二是供给方要提供需求方显示偏好的

平台和激励措施,并能够将这种偏好纳入到决策中予以考虑。

语言准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也应该遵循上述原则。教育部发布部分汉字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是一种将语言使用者需求偏好纳入到语言决策调整过程中的一种做法,为语言使用者提供一个显示自己需求偏好的机制,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较大争议?笔者认为,还是与这种需求意愿和偏好的显示有关。从整个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来看,征求意见稿只是对即将作出公共产品最终决策的一个局部改进,是一种事后行为,语言使用者的建议和意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种即将作出的最终决策行为,取决于语言使用者、语言生产者和语言提供者三方的博弈。假设在做出方案之前,就发布相关的征求意见稿,或者举行事前听证,又或者邀请公众代表进入事前的决策过程中。简言之,就是在作出供给决策之前,就提供公众发表意见和建议的平台和机制,那么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目前出现的调整方案困境。语言权力不仅仅包括语言的使用权,还包括语言制度的修订权,权威部门不但需要看到自己修订语言制度的权力,也要看到和尊重公众对语言制度的修订权或者是发表意见的权力。

### 4. 语言的调整是制度变迁的一种体现,要充分考虑到语言调整的路径依赖性,并将其纳入到制度变迁的成本中予以考虑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道格拉斯,1990)。语言作为一种制度,亦是如此。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人类社会早期,语言更主要的属于一种非正式制度,也就是亚当·斯密和弗里德曼所论述的,语言与市场的自发成长过程是相似的,不需要任何人按照任何规则设计它,是随着千百万人的语言交流自愿合作建立起来的,这是早期语言演变的实质。但是,后来发现,如果语言长期是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出现,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市场交易活动将会面临着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而且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将越来越大。到了现代社会,语言大部分是以一种正式制度的形式出现,也就是政府部门通常以法律规范等形式来进行语言的制度安排。语言文字是一种社会制度,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念,任何社会制度的变革

都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因素的作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路径依赖意味着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任何体制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社会环境。

从动态角度来看,制度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是制度变迁最重要的来源,这种作用的内在机理在于相对价格变化改变了人们在互动过程中的激励。也就是说改变了人们在心智构念(mental constructs)中的成本—收益均衡模式,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状态,这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就会出现。语言作为一种制度,也有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语言的调整是制度变迁的一种表现形式,语言调整的关键也在于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也就是调整后的语言所产生的经济绩效是否大于调整前的经济绩效。如果语言调整后的净收益大于调整前的净收益,语言的调整具有可行性。但是语言既是一种公共产品,又是一种文化产品,具有非正式制度的特性。正如诺斯所述,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非正式制度在社会演化中对行为人的选择集合产生重要影响,加之,由于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约束往往不会对正式规则的变化作出即时反应,因而这些非正式约束嵌套在其中的文化则会在“制度的渐进演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而成为了路径依赖的根源”(North, 1990)。也就是说发展的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源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都将强化这一进程(诺斯, 1990)。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和制度,相较于其他制度,其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更加明显。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应该纳入到语言调整决策的成本中予以考虑。此次汉字写法调整事件充分体现了语言作为一种制度,其调整的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并成为语言调整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一种成本。公众对此次汉字调整反应如此强烈,主要源于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对既定的汉字写法形成了特定的习惯,这种习惯性使人们产生了依赖性,而且这种依赖性是以由此产生的巨大经济绩效为支撑的。而汉字调整后的写法还不足以激励人们产生调整的动力,况且还需要承担巨大的变动成本。正如胡范铸、陈佳璇(2009)所指出的,《通

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提出调整44个汉字字形的目的是使“字形更趋于规律性、系统性”,改善汉字字形的理据性,其用意无可非议。但问题是:第一,与汉字的“路径依赖性”相比,汉字的“理据性”是否更为重要?第二,调整了这44个字形,汉字字形的“规律性、系统性”,是否就能够解决了,如果不能,是否还要不断地调整?

## 五、小结

必须承认,人类社会的制度现象及其生成机制、内在构成、演变路径、影响因素实在太复杂,以致目前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机理、动力和原因,我们仍然有许多并不十分清楚的地方,正如诺斯教授(1990)所说的:“对于制度的严谨研究,我们才刚开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作为一种典型制度的语言,关键在于把握其内在属性和变迁的轨迹。语言早期更多的是以传统、习惯、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出现;随着人类交往活动频率不断增加和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以非正式制度形式出现的语言的局限性越来越大,以至于语言变迁的相对价格出现变化,即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使语言使用双方感知到通过改变协定或契约(改变语言的制度形式)能使双方的处境得到改善,这时作为最大制度供给者的国家就会出面,调整语言的制度形式,即保留语言多样性的同时强制性地提供以正式制度形式出现的语言。当然,这是一个简化的分析过程,清晰认识语言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变的变迁过程,对于我们科学制定语言政策,特别是语言调整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政策作为一种具有垄断性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一些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国家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在任何长期的变迁过程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首要的一席。当然,国家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是建立一系列的游戏规则,并将之付诸实施,以鼓励全民充满活力地加入到经济活动中。当前国家作为语言制度的最大供给者,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提供什么性质的制度,二是制度供给的数量,三是制度供给的效率。归根结底,在于能否及时提供有效的语言制度,满足社会不同经济主体对语言的需求。这就告诉我们,语言具体的调整过程,必须充分了解需求或者使用主体的偏好,而且许多制度的建立或者变迁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成本—收益的计算,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对于语言这一特殊



的制度安排,路径依赖较其他制度变迁更强,而且这种路径依赖还成为影响语言使用主体需求偏好的重要因素。

我们甚至可以借鉴2009年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公共事务治理方面的理论作为我们进行语言公共品供给决策分析的新视角。奥斯特罗姆(Ostrom,2000)曾归纳了实现公有资源有效治理的八项原则<sup>①</sup>:(1)公有资源本身的边界必须界定清楚,包括对公有资源群体成员和非群体成员的明确区分;(2)新制度或治理模式必须与当地的物质资源特征和社会文化特征相适应;(3)全部或至少部分规则是由当地参与者提出的;(4)监督必须是有效的;(5)对违反制度的个体采取分级惩罚,即根据违约程度的不同实行不同程度的惩罚;(6)必须存在低成本地化解或协调冲突的机制;(7)外部政府权威必须能够认可自治组织;(8)必须存在分权制的组织。上述8个原则成为创建公有资源自治组织的必要构件。其中的(2)、(3)、(6)条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分析语言公共品供给的相关理论视角。

语言规划问题本质上属于一个国家语言政策的战略问题,牵涉千家万户,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汉语言文化属于基础性知识类别,加之其天然的大众属性、民族属性,其调整引起大范围、激烈的民间争议,实为必然,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充分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尤其是语言使用主体的意见,谨慎评估其后果,走渐进式调整的道路。汉字调整的背后其实隐藏的是语言话语权之争,政府作为掌控资源的语言规划的决策者,在语言调整的博弈过程中,要做到中立,最大限度地反映主流文化和主流使用主体的意愿。关于汉字繁与简的争论,实质上背后存在着一个语言经济学的问题——它凸显了语言文字自身变迁的经济规律与现代人文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需要间的一个矛盾,是由两种字体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文化收益共同决定的(刘国辉和张卫国,2010)。

#### 参考文献: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2000.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

- 制度的演进[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 薄守生. 2008. 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J]. 制度经济学研究(2):58-80.
- 道格拉斯·C·诺斯. 2008.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 贾康,孙洁. 2006. 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机制的研究[J]. 管理世界(12):60-66.
- 刘国辉,张卫国. 2010. 语言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2009(首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综述[J]. 制度经济学研究(1):242-248.
- 汪丁丁. 2001. 语言的经济学分析[J]. 社会学研究(6):86-95.
- 张卫国. 2008. 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框架[J]. 经济研究(2):144-153.
- 朱成全. 2004. 经济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J]. 自然辩证法研究(9).
- BRETON, ALBERT. 1998.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Language [C]. Economic Approach to Language and Bilingualism,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Canada.
- DALMAZZONE, SILVANA. 2000. Economics of Language: A Network Externalities Approach [C]. Exploring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The Department of Canadian Heritage.
- GRENIER, GILLES, VAILLANCOURT. 1983.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partment(4):471-483.
- GRIN Francios. 1996.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Survey, Assessment and Prospec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121.
- GRIN Francios. 2000. European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J]. Homepage of Languages and the Economy: Canada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11):13.
- SEARLE John. 2005. What is an Institution [J]. Journal of Institution Economics(1):1-12.
- SELTEN Reinhard, JONATHAN Pool. 1991.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Skills as A Game Equilibrium [M]// R Selten. Game Equilibrium Models. Berlin: Springer-Verlag.
- SAMUELSON Paul. 1954.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387-389.

(编辑:南北;校对:杨睿)

<sup>①</sup> 黄凯南: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什么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http://www.cer.sdu.edu.cn>.